

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

——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李永新

内容提要 雷蒙德·威廉斯不但批判地接受了以利维斯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而且将其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抛弃了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接受了其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此为切入点,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有机联系起来,在深入分析文化内部结构层次的基础上理清了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英国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 语言 文化唯物主义

李永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如何有效地分析并阐释文化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威廉斯一直努力思考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威廉斯也正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思考的基础上,最终于1978年提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约翰·希金斯后来指出:“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威廉斯试图为他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命名,但是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又指明了他对仍在发挥作用的现有的英国文学研究体制的文学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回应。”^[1]威廉斯的确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又在承续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反叛。但是,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是,威廉斯是如何将两种复杂的理论传统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思考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此外,威廉斯尽管多次提到“文化唯物主义”并不断对其进行界定,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素。这在增加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的同时,也为结合威廉斯思想的发展深入分析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13CZW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进逻辑”(10YJC751050),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研究”(2010SJB750014)的阶段性成果。

[1] John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25.

威廉斯与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特别是利维斯学派的关系非常复杂。后殖民理论家艾哈迈德曾提出威廉斯是利维斯学派的反对者的观点^[1],这一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威廉斯后来回忆的证明。1977年,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访谈时提到,20世纪40年代,他重新回到剑桥之后,“处于战后的通常心境:失败的必然,努力的荒诞,放弃的必要……”。这是因为他与利维斯学派秉持不同的文化观念,并存在两个重大分歧:第一,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邻里”的含义问题,威廉斯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在威尔士邻里意味着什么”,然而利维斯学派成员则认为堕落的机器文明中根本不存在邻里。第二,关于艾略特晚期诗歌,威廉斯反对利维斯学派对《四个四重奏》的解读,并且“围绕着那些诗歌和对诗歌的批评出现了阶级斗争”。因为在威廉斯看来,“如果你不仅进入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之中,而且进入到《四个四重奏》构成的更为宽广的世界,那么你就完成了阅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威廉斯也指出,利维斯学派的文化激进主义、实用批评以及对教育的重视都对他有重要影响^[2]。事实上,威廉斯出身于威尔士铁路工人家庭,根本无法接受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但他依然继承了利维斯学派的理论分析路径与文化批评方法,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总体论与有机论特点。

首先,威廉斯在摒弃阿诺德文化精英主义立场的同时,接受了其文化应发挥社会批判作用的观点,延续了文化与社会的理论分析传统。面对19世纪英国有机和谐传统文化的全面崩溃以及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而引发的道德危机等问题,阿诺德提出的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唯一方案“是依赖个体的善,更进一步来说就是他的文化观念;他的理想是让人们超越自身,以至于能够使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能够服从于更高的关系”^[3]。他认为,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寻找稳健可靠的权威,才能引导人们获得内心的完美并实现自我的完善,也才能抵制因物质世界的各种诱惑而带来的人格堕落,取得与社会的协调。阿诺德的文化观尽管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但却凸显出以文化批判改变社会的特点,为威廉斯进一步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次,威廉斯受到艾略特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不但把日常生活领域作为文化分析的重要对象,而且充分发挥了文化“在对那种经验及其伴生的所有思想的解释中”的作用^[4]。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指出,文化具有个人文化、团体文化或阶级文化以及全社会文化等三种意义。这三者既是不可分的,又在社会中存在高低之分的层次性。艾略特通过比较文化和宗教指出,“我们仍然可以从某一方面把宗教看成是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高级的文化与宗教是统一的。但是,低级的文化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应该包括一个民族特有的所有活动和兴趣爱好:大赛马、亨利赛艇会、帆船比赛……十九世纪哥特式教堂以及埃尔加的音乐。”^[5]艾略特的这一说法是对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的一个修正,使文化的意义得到进一步延伸,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通俗文化现象。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延续了这一理论分析路径,提出了文化“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6]的观点。

最后,威廉斯还将利维斯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在反对以往的“趣味”批评的同时提出相对清晰的文化批评标准。利维斯和一群坚持少数人文化观点的知识分子以《细绎》杂志为中心,对文学展开了社会文化批评。他们为凸显文学所具有的抵御社会物化力量的作用,抛弃了以文本解读为基本路径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更重视研究如何评价文学作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这

[1] Aijaz Ahmad,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pp. 46-49.

[2][4] 参阅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51页,第79页。

[3] Lesley Johnson, *The Cultural Critics: From Matthew Arnold to Raymond Williams*,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27.

[5] T.S.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译文略有改动。

[6]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7页。

一文学批评方式对威廉斯后来所发起的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为:(1)它以批判的立场考察社会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为后来广告、传媒等进入文化奠定了基础;(2)对文化、历史、语言和传统等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进行考察,使文化本身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领域;(3)《细绎》对于教育改革的强调,为后来文化进入政治斗争,突破阶级界限,寻求共同文化带来理论上的启示^[1]。

威廉斯在批判利维斯学派的基础上,也在多个方面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启迪,并将文化与社会这一文化批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接合,从当下社会变动不居的文化经验的角度探索社会的总体性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威廉斯分别出版于1958年和1961年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著作更像是文化主义与唯物主义、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结合。”^[2]这种结合的最重要体现是威廉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感觉结构概念。“我要使用的术语是感觉结构:它就像‘结构’一词所指示的那样是固定而又明确的,当然它也是我们的活动中非常微妙而又不可确知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普通组织的全部要素所发挥的具体而又鲜活的作用。”^[3]因此,感觉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既可以揭示人们在特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体验,又可以分析并重构这一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还能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历史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汤普森也对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提出了严厉批评:“冲突问题变得模糊不清;战胜与失败遭到低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被打扮的花枝招展……在威廉斯的文化史中,没有好人与坏人,只有处于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感觉结构。”^[4]

二

汤普森措辞严厉的批评的确指出了威廉斯这一时期所存在的问题。威廉斯对感觉结构的分析在反对利维斯学派精英文化观念的同时,试图从总体性的社会及人类生活方式的角度剖析人类思想意识的变迁,但其探索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从总体互动的角度理解社会关系,却没有更为深入地分析作为社会互动关系动力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萨义德在《理论中的旅行》中认为,威廉斯是卢卡奇的社会总体性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者^[5]。这一观点虽然遭到了威廉斯的明确反对^[6],但却也指出了—一个明确事实——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斯研究并接受了戈德曼、葛兰西等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不过,在理论观念更新之前,威廉斯在《现代悲剧》(1966)、《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1968)、《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1970)等文学批评著作中已经开始对感觉结构的内部层次进行探索,并开始从物质基础,特别是语言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为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并强调探索文化的物质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与文学批评实践角度来看,威廉斯继续站在激进文化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戏剧、小说等传统文学体裁和电视等新兴媒体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已注意到感觉结构内部的层次关系。为了阐明这一问题,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分别从教育、出版、阅读、创作和文学惯例等角度分析了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在后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威廉斯开始意识到教育与出版等具有物质性特点的因素主要通过介入人的认识过程并干预人的认识方式来对文学艺术发挥限制性作用。“从感觉结构

[1]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n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2.

[2]Andrew Milner, *Cultural Materialism, Culturalism and Post-Culturalism: The Legacy of Raymond Williams*,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1(1994).

[3]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p.48.

[4]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I)*, in *New Left Review (I/9)*, 1961.

[5]参阅萨义德:《理论中的旅行》,载《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7-424页。

[6]Raymond Williams, *What I Came to Sa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3, p.273.

的角度来看,艺术家首先要与结构——不是各种新出现的尚未成熟的反应、兴趣与认识,而是由其转化成的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与世界的组织过程——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组织过程是发生在艺术之外的同一时代的所有真实活动及其结果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只能借助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与这个过程建立联系。”^[1]不过,威廉斯认为,除了以具体戏剧作品为例研究感觉结构之外,还应该深入探究处于感觉结构最底层的形式、意义与情感等问题。“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研究所关照的对象远比具体的文学作品广泛,还可以是语言、方法、惯例。”^[2]

除了在批评实践领域提出要从语言和意义角度探索感觉结构之外,威廉斯还扩展理论视野,借助戈德曼、葛兰西等理论家的理论分析文化背后的物质基础。威廉斯指出,感觉结构“主要是为了指明特定历史语境中一个作家群体的共同特点,也可以表示另外的历史语境中另外一个作家群体的特点。我后来经常反思这个概念的准确用法。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戈德曼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自身包含社会与文学关系的结构这一概念”^[3]。戈德曼将文学和世界都看作是处于不断变化与组织过程中的精神结构,并指出这两者并不是分离关系或反映关系,而是同源、同构和意指关系,也即文学作品的精神结构除与作家的精神结构存在同构关系之外,从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更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存在同构关系。威廉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将总体性的社会分为自然真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处于不断组织过程中的信仰与惯例。“但是对我而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同时对潜存的与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结构的认识与回应。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与回应的确构成了具体的文学现象:在形成虚构与戏剧化情节的过程中,各种构成因素、真实的生活与信仰既同时被实现了,更为重要的是,也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验,因为在想象行为、想象方法以及具体而又完全新颖的想象性系统中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

为了深入分析总体性的社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威廉斯进一步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探索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其中存在意义与价值的选择与协商。“总体性这个词已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限。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5]为了更好地说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威廉斯认为应该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既是现实社会中频繁变化的真实因素,又是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不断处于更新、重构和修正过程的因素。霸权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指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总是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种意义和价值体系在建构人们对现实的感受与期待的同时,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以防止其主导地位受到削弱。“选择始终是关键所在;选择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内选择某些意义和实践并加以强调,否定和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是重新阐释并削弱这些意义和实践的某些成分,或者把它们表达为支持或至少是与实际的主流文化内的其他因素不相矛盾的形式。”^[6]

“威廉斯思想的转向首先体现在《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西安·戈德曼》(1971)……在此,威廉斯明确地将自己与唯物主义文化分析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一传统是由卢卡奇提出并且在他看来是受到戈德曼进一步发展的。”^[7]威廉斯的这种思想转向在《关键词》中得到了明显体现。“我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

[1][2]Raymond Williams, *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7, p.19, pp.19-20.

[3][4]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80, p.22, pp.24-5.

[5][6]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二辑),傅德根译,刘纲纪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第335页。

[7]Dennis Dwor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m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0.

在某些思想领域里,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遍的词汇)的方法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某些其他的用法,在同样的一般领域里,引发了争议与问题,而这些争议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察觉的。”^[1]威廉斯对关键词内涵的界定充分显示出他以语言作为分析重心,把词义的变化看作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社会生活不断互动的结果。语言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其本身是一种与社会历史无法割裂并处于构成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语言意义的变迁不仅作为一种要素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其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承载者,对社会历史变革发挥复杂的作用。威廉斯以此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在本书各个部分中进行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键要素及其变化的分析和讨论中,我还尝试着建立一种观点。……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作文化唯物论,它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其细节从属于总的观点,但我要说,这正说明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

三

威廉斯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但并没有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是指出这一概念是在阐发和解释各种文学艺术的具体实例的基础上得来的,并且此前的一些著作已经对“符号”、“标写”、“感觉结构”等概念做了深入分析。“不过,这里之所以重新提及这些例证,目的无非是提醒读者,本书不是一本孤立的理论著作,而是基于从以往研究中所获得的一切所作出的理论阐述,这种阐述进而同马克思主义建立一种新的自觉联系。”^[3]这也说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既是对以往文学批评工作的理论提升,也是自觉地在文学批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在文化与社会这一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理论框架之内,充分吸收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作为切入点,将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具有空间隐喻特点的完全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既充分承认上层建筑作为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起来的领域,具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又指明基础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在接受人类建构的同时也限制乃至决定着人类。

威廉斯后来进一步解释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他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作为社会与物质生产过程的文化的理论,一种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运用的具体实践与‘艺术’的理论,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涵盖了从作为物质性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各种具体的写作技术与写作形式,乃至各种机械与电子通讯方式等”^[4]。威廉斯在论述这一概念内涵的同时还指出,他之所以能够在广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因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处于具体社会构成中的意义与价值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再生产),语言和交流作为社会建构性力量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制度与形式以及社会关系与形式惯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5]。简单来说,这是关于语言和交流的唯物主义理论。“文化唯物主义是在意义生产的实际方式和情形中对意义的各种形式,特别是作品进行分析。”^[6]威廉斯甚至更为直接的指明,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符号学,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既强调语言的物质性特点,又以此为基础站在作为“生产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过程”^[7]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分析文化内部的结构层次,进而理清文学与社会、权力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系。

威廉斯延续了巴赫金将语言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中进行分析的思路,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理论思想的发展中,人们应予以关注的重要之处有:其一,它强调语言是活动;其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7 页。

[2][3][7]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 页,第 6 页,第 58 页。

[4][5]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80, p.243, p.243.

[6]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in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4, p.210.

二,它强调语言有历史。”^[1]因为马克思强调,语言不但与意识合而为一、同时共存,而且根本不是一种思维的工具或观念的表现,而是一种发挥着构成性作用的物质性活动。进入 20 世纪之后,巴赫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语言“符号”的二重性,认为语言的形式因素与其所负载的意义之间的约定俗成的关系是受社会发展的制约的,并且语言还以形式与意义的二重性取消了个人与社会、意识与现实、语言与物质存在的对立,并转化为“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就是一种充满能动的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2]。这种接合表述是运用形式符号进行意义创造的充满物质性的实践行为,既是特殊的实践意识,又与所有的物质性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符号的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3]。

正是从这样的语言观念出发,威廉斯提出文化“究竟是指与‘社会’相关的‘艺术和精神生活’的理论,还是指创造特定的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的理论”^[4]。他认为,根据语言的物质实践性特点,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构成性的“表意系统,一种社会秩序必须藉此(尽管也存在其他方式)得以交流、复制、体验和探究”。文化的两种意涵藉此可以实现“有效的聚合”^[5],因为所有社会活动在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中都能够以表意系统的形式存在,其中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作为一种表意实践不仅属于更为宽泛的文化表意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相对专业而又复杂的衍生领域。事实上,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具有超越文化表意系统的衍生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还拥有另外一个基础——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文学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与社会历史同步发展变迁的精神现象。”^[6]在威廉斯看来,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既可以指专属于某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指错误的观念或意识,还可以指各种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不过,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信仰体系还是错误意识,都因过于抽象而妨碍对社会过程的检查。因此,意识形态应该“回到具体的、实践维度中”,并且借助意指活动这一核心性的社会过程,使人们“自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及其冲突的人”^[7]。

基于此,威廉斯进一步指出,文学作为文化表意系统的一部分,也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展示着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因为,文学根本不是一个意义固定而抽象的概念,而是借助具有物质性特点的语言在表征各种利益关系的同时,通过复杂的冲突与碰撞建构而成的。“我们进而可以把‘文学’作为写作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形式,同那些抽象的既往概念(这类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十分常见)区分开来。”^[8]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把文学看作一种上层建筑,又强调文学自身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自然既抹杀了文学的特殊性,也难以厘清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和历史范畴”。“正是由于文学具有历史性(这是一种涉及文化主要阶段的关键概念),文学才成为强烈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而又正是在这种前提范围内,杰出的和具有永久重要地位的文学才能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中建成。”^[9]文学借助语言建立起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形成与特定的阶级、组织乃至印刷与传播技术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文学的内涵也因此而不断转变:18 世纪之前表示“读写能力”,后来则表示“趣味”和“感受力”以及“创造性”和“想象力”等^[10]。

[责任编辑:平 啸]

[1][2][3][4][7][8][9][10]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第38-39页,第40页,第16页,第75页,第46-47页,第56-57页,第49-50。

[5]Raymond Williams,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13.

[6]舒开智:《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概念演进》,《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